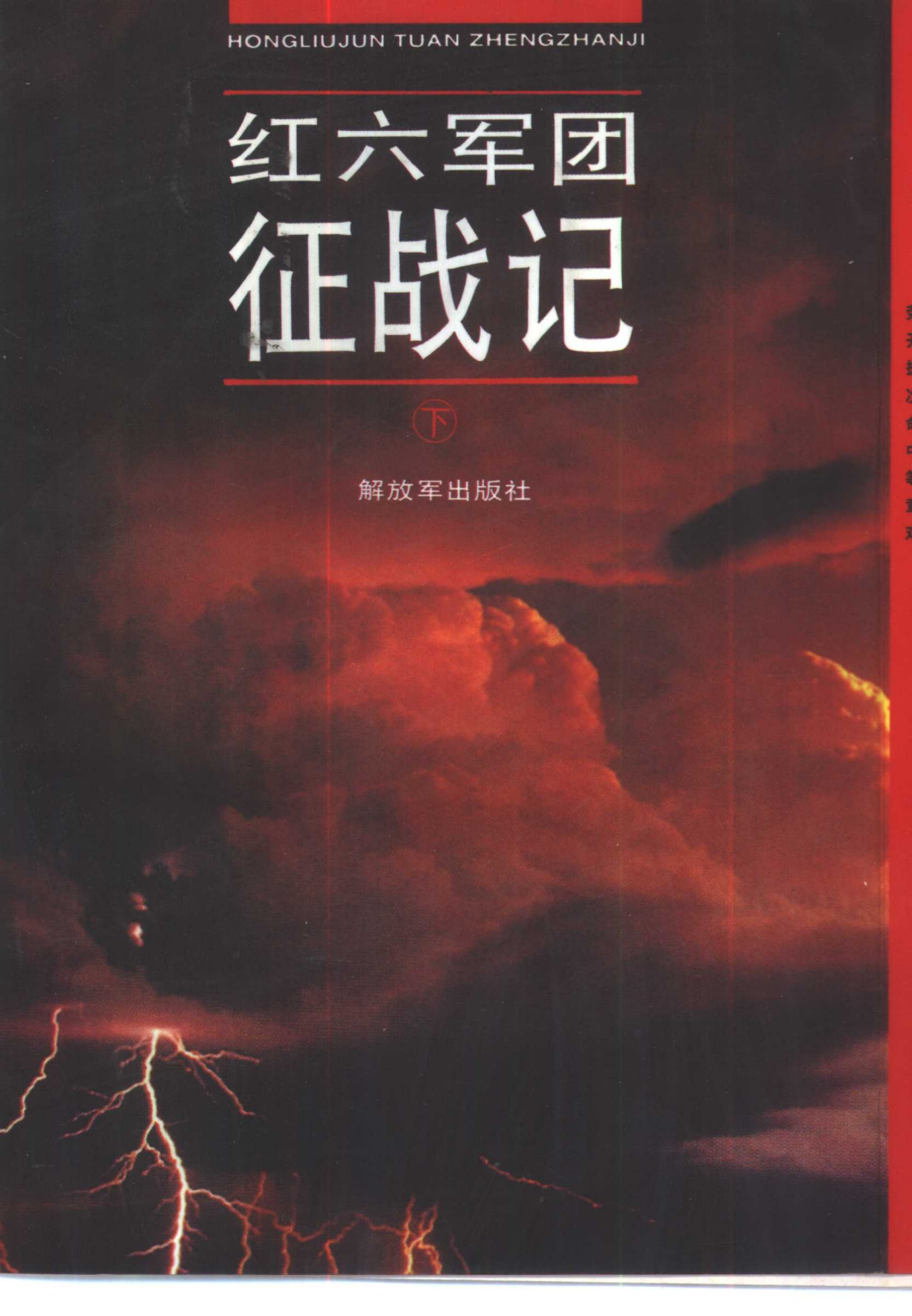


HONGLIUJUN TUAN ZHENGZHANJI

红六军团 征战记

Ⓣ

解放军出版社



红六军团征战记

(下)

本书编辑组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六军团征战记(下)本书编辑组.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6

ISBN 7-5065-2308-6

I. 红… II. 本… III. 红六军团-史料 N. E29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3469 号

书 名: 红六军团征战记(下)

著 者: 本书编辑组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刷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625

字 数: 467000

版 次: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5065-2308-6/I·275

定 价: 12.50 元

目 录

坚持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斗争·····	肖 克(1)
回忆湘鄂川黔边的斗争·····	晏福生(14)
两军会师第一仗·····	周仁杰(30)
挺进湘西·····	唐子奇(39)
遵义会议的光芒·····	周仁杰(44)
回到党的怀抱·····	方 国(52)
死亡线上的斗争·····	刘俊秀(59)
战火中诞生的医院·····	李 真(66)
扩红琐记·····	徐国贤(73)
买 桥·····	谢中光(78)
红旗卷起农奴戟·····	彭 林 罗 斌(81)
我见到王震同志·····	邓东哲(88)
战忠堡·····	刘转连(93)
板栗园伏击战·····	贺庆积(99)
热血洒在招头寨·····	贺劲南(105)
难忘的鱼水情·····	李 文(109)
转战湘鄂川黔边·····	刘成达(114)
艰苦转战五十天·····	龚 辉(127)
红十八师单独突围长征·····	彭湘臣(139)
酉阳激战·····	李华仙(146)
“置之死地而后生”·····	陈 靖(153)
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纪实·····	梅兴无(156)
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	任弼时(169)
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肖 克(182)

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	肖 克(197)
抢渡澧水、沅江	刘转连(212)
突 围	李 立(219)
点燃锡矿山的革命烈火	覃国翰(223)
枪炮声中过元旦	朱家胜(230)
顺岩河急流架桥	周仁杰(234)
扎佐夜战	刘转连(239)
将军山战斗前后	刘转连(242)
角逐在湘黔边	张钰秀(247)
长征途中创建的苏维埃政权	张钰秀 颜金生(255)
乌蒙山回旋战	朱家胜(269)
归 队	熊 晃(277)
长征时的红十八师电台	黎东汉(283)
八千里路云和月	左 齐(287)
唤醒了的山城	左 齐(294)
苗汉一家亲	谢中光(298)
军民之间	杨宗胜(304)
从乌蒙山到金沙江	张钰秀(310)
抢渡金沙江	周仁杰(323)
石鼓渡江	丽 江(332)
归心似箭	叶长庚(337)
胜利终归我们	贺庆积(345)
革命理想高于天	李 贞(349)
长征纪事	谭善和(353)
我军政治工作者的楷模任弼时	晏福生(363)
红六军团教导团在长征途中	贾若瑜(374)
长征中的任弼时	章学新(388)
忆任弼时同志	陶汉章(403)
南回北折长征路	陈云开(410)

忆红军俱乐部·····	金忠藩(424)
红六军团通信工作回顾·····	江 文(427)
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 ·····	龙振彪(440)
在雪山草地的艰难日子里·····	王恩茂(452)
翻越玉龙雪山·····	李 立(459)
雪山之夜·····	朱家胜(465)
雪山一日·····	贺正文(471)
在长征的道路上·····	马忆湘(473)
甘孜会师·····	谭尚维(492)
艰苦的草地行军·····	李 立(496)
印在心头的足迹·····	李 真(502)
吃饼子·····	方 国(508)
一碗狗肉汤·····	余清泉(510)
过草地·····	邓东哲(513)
筹 粮·····	刘崇喜(516)
草地“狗肉宴”·····	韩德辉(519)
一碗炒面·····	颜文斌(522)
“野菜还是由我先尝”·····	陈云开(524)
葛曲河边·····	林文兴(526)
怀念张师长·····	熊 晃(528)
通过回民区·····	谭 克(532)
飘动的篝火·····	朱家胜(535)
“活着,就不能离开红军” ·····	袁福生(539)
回忆模范师·····	刘转连(544)
到了家·····	朱家胜(554)
刘伯承在红六军团·····	贺庆积(557)
光荣的使命·····	刘道生(567)
独臂将军历险记·····	黄继祥(577)
后 记·····	(588)

坚持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斗争*

肖 克

1934年10月28日,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的统一领导下,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的龙山、永顺、保靖、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他害怕我军返回湘西,赶忙派出龚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湘西。我先经湖北省西南角来凤县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寨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转头东进,甩开敌人,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在永顺,我们分析了敌我整个情况。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正被我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军阀徐源泉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醴州。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约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子弟,但均为严酷战争铸冶的觉悟战士,加之两军领导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同时还可得到群众支援,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消灭这股敌人。只有消灭了这股敌人,才能够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这就更坚定了我们歼灭陈渠珍的决心。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近。为迷惑诱敌,我们故意示弱,主动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过永顺

* 此文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之一部分,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1期,收入本书时作者略作修改,标题为编者所拟。

向北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因敌主力没离开城市，考虑其先头退而固守，我故继续北撤。第二次拟设伏于吊井岩，后又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这个地区，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七公里多，东西最宽处为二公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可装入大量敌军。谷地两侧林丰树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于是，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部和四师部署在毛坝附近，把十七师（两个团）放在杉木村东山，把十八师（一个团）放在北山。11月16日下午4时左右，敌前军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我们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配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立即向前追击。追了五公里多，发现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二公里左右的把总河筑构工事，企图顽抗。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和二军团第十八团，立即准备夜战。经简短的火线动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第二天追到永顺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枪二千支，打垮了长期盘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得好，敌人主力都追中央红军去了，湘西空虚，敌人战斗力不强，弱的好吃。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弱，敌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地形选得好，我们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两个军团团结一致，沉着勇敢，动作迅速。当夜间攻击杨其昌的时候，十八团和五十一团并肩攻击，都打得好，发扬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也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六军团西征以及

与二军团会师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新苏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后，我们留下一些部队，在那里做地方工作，开始建立省级机构，展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进攻大庸，歼灭另一支地方军阀朱华生旅一部，并占领了大庸城，稍加休整，主力向南打沅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南，在桃源、沅溪河一带给罗启疆的独立第三十四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占领桃源，包围常德。

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红军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约百万群众开始发动起来了。打开这个局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我们把湘西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三十四旅打垮了，包围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了统治阶级，鼓舞了革命群众。第二，部分地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他们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对付我们，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湖南军阀何键怕我们打长沙，急令在湘南拦截红军的敌十九师、六十二师和十六师兼程北进。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也改变了蒋介石要他去四川与川陕红军作战的行动，调了三个主力师分别部署在鄂西施南一带和湘西的津澧地区。蒋介石也速令在江西的二十六师增援常德，并以四个师的兵力转到湘黔边境。当时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转入贵州，国民党六十二师、十六师追至通道西四十里之新厂，因我们打到桃源，这两个师就改向北调，向我进攻，这对中央红军的行动是有力的策应。

二、六军团会师以后，为什么能够胜利？湘鄂川黔根据地为什么能很快地建立和发展？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全体指战员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决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我们虽然是两个根据地临时会合起来的军队，但都有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强烈愿望。二军团离开了洪湖，离开了湘鄂西，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深感到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六军团离开了湘赣苏区，长途行军，既不能休整，也不能

练兵，也有同样的感受。还应看到，六军团长途奔驰两个多月，进到地形、民族、民情、风俗与江西不同的贵州、湘西，就对和这一带人民有联系的红二军团，带着依存心情；二军团过了两年的流动生活，对于带来了朱、毛红军光荣传统的六军团，思想上也有向往之情。加以贺、任这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德高望重，所以会合之后就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而战斗。八千子弟兵一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马到成功。

第二、正确选择了战略突出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攻势。所以，两军会师后，战略上指向湘西。因为湘西只有陈渠珍的土著部队，是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我党在那里又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利于我们发展。在湘西攻势中，我们的作战方法也有很大改变。六军团在湘赣苏区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在战略转移中有很大的削弱，使我们体验到（虽然当时是不大自觉的），只能和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再不能采取退出湘赣苏区前两个月那样，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所以在战役战术部署上，采取诱敌入彀，息而歼之的方针。这种打法，过去是用于敌人进攻根据地条件下的。我们新到湘西，敌人很快就来进攻，我们还来不及把根据地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起来，采取诱敌入彀，息而歼之的战法比较有利。这是属于诱敌深入范畴的，只是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罢了。但战役态势和中央苏区时期近似。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入战略反攻，打下大庸，南逼沅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进占桃源，打常德，又占慈利，展开了在广大区域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进攻。这个战例，使我们认识到，即便在白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能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只是条件不够，不大典型。例如在白区就不能像在根据地一样坚壁清野。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反“围剿”时，曾把坚壁清野和诱敌深入并列提的。

第三、批判了夏曦同志的错误，加强了两军团的团结。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左”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到和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四千多人了，特别是执行了“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一些有长期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使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如原六军军长段德昌同志，就是这个路线的牺牲者。第六军是洪湖地方党在秋收起义后，在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颗江汉洪流涌出的明珠，在1930年7月4日，与贺龙同志带领的红四军，在洪湖会合，真是双璧相映，分外光彩。

夏曦同志脱离群众，犯了许多错误，两军会合后，对他进行了批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可能从“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倾路线问题）。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样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当了。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是难免的。对一个同志的功过，应当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对夏曦也是一样，应当从他一生

的革命活动中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在1920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同志是第一批团的参加者，随后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他和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工作过。后来毛泽东去广东，邓中夏到长辛店，夏曦在湖南活动。他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与郭亮齐享盛名。十五六年前，李维汉同志和我较客观地谈过他的情况。杨尚昆同志在七大大会上讲过，夏曦同志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苏区，他执行了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二、六军团会师后他受到批评，分配做地方工作，后来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易近人，我和王震同志都承认他有水平，尊重他。1936年3月，我军退出毕节，在野马川、七星关地区，他去作抗日救国军一支队长席大明的工作，返回时过河不幸溺水牺牲。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即便在这个时期，也要具体分析。如1934年6月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决定创建黔东苏区。在这时期，红三军重新建立了党团组织，恢复了政治机关，为建立黔东根据地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在中央对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批评之后，开始加以纠正。又与贺龙同志决定处决大间谍熊贡卿等等。这都是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若干重大的、正确的措施。虽然这些都还谈不上是路线上的转变，但作为当时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有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胜利进行反“围剿”

1935年初，敌人派兵六个纵队，向我们建立不到三个月的湘鄂川黔边游击根据地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了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

未稳之机，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湘鄂西部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我根据地与外地贸易，禁药、禁盐、禁布匹。

面对敌人的“围剿”，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广大农民，积极进行了反“围剿”准备工作，制定了作战方案。这时，党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克服了当时党内极为严重也是主要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以后，于2月1日给我二、六军团来电，要我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这个提法和过去不大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话问中央，中央即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我们就在部队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学习讨论，把运动战、游击战提高到战略思想上来认识，自觉地抛弃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军事原则，认识到敌人的“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斗争的规律，理解了遵义会议是对过去军事路线的否定（当时还没有“左”倾路线的提法）。还有两军会师之初，我们的战略方向和战斗行动，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在有利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运动战、游击战，所以取得进军湘西的胜利。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就越来越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在战略转移中，必须不放过有利时机坚决消灭敌人，才能提高士气

和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才能争取休息,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遵义会议的精神,使我们思想上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利用湖南的何键和湖北的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调不统一,指挥不统一的矛盾,首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向来的敌人。

3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我向前迎击,消灭了敌人一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我们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那时我们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不再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如果没有歼敌可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一天多路,到了桑植县陈家河,发现离我们五公里多的地方有敌五十八师陈耀汉部来堵截,大约有两三个团。第二天早上,我们向前占领了阵地,认为地形对我有利,恰巧敌人向我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进攻的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的时候,我们抓住时机,转为战术反击,打到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一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进一步把情况摸清楚了。陈耀汉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可能会从桑植向桃子溪方向来。于是,我们决定向桃子溪方向前进,打遭遇战。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个团先走,走了三十公里,下午4点了,离桃子溪还有五公里路时,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判定一定有部队过去。于是我们继续向桃子溪前进。路上遇见一个老乡,说桃子溪刚才到了敌人,后面还在继续来。这样,我们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计是五十八师的另一个旅加师部。因为他们刚到,我们又是从距离桃子溪七十多里的陈家河赶来,马上打,正是出其不意,就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叉路上,把两个

团展开，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措手不及，一下就被冲垮了。敌人退到后山，这时，后面一个团到了，我军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战斗才结束。给陈耀汉的师部和一个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兵力击破优势敌人（我以三个不大充实的团，打敌两个正规团及师直属队）。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本造的），大家很高兴。由于敌五十八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从而为巩固根据地，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八十个团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湖北徐源泉的四十三师、四十八师和谢彬的八十五师都来了。湖南方面，敌人虽然不那么积极，但数量大，三个正规师（一师六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就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东南对湖南取守势，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月起至8月初，在三个月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灭了敌四十一师师部、第一二一旅和特务营，俘虏该师师长张振汉；8月初又在板栗园战斗中，一举消灭了八十五师，击毙了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张振汉虽然是高级军官，但我们根据党的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对他宽待。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请他当战术教员，还请了一些解放来的也有军事技术的军官、军士当教员。抽调有战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八百名，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张振汉就在高级班教课。打败仗的人怎么能教打胜仗的？要知道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术、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科学，不管红军白军，有很大共性。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至于如何运用，则决定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还有打败仗的人，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和蒋介石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或许多打败仗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十月革命后，

列宁不仅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搞工业，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确实起了好的作用。林彪在1952年就曾在怀仁堂军委会议上攻击我军利用旧军官任教。1967年，大野心家江青也叫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笑话，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让这些人来当教员。林彪、江青的这些谰言，完全是形而上学，根本不懂得革命事业必须善于吸收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一切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不杀张振汉，还请他当教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长征时，我们带着他走，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决定放他回去，回去后参加了抗战。他家住长沙，我军解放长沙时，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还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

我们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在新建立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省委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地方武装及军队后方工作。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后方抓紧建党、建军、建政、青年、妇女及农村各种群众工作。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得新的胜利，又得到大量的兵员、武器和物资的补充，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但二、六军团由于受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的影响，六军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所以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中，更加发扬了。后来我们到华北、华东，还是这一套。

退出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我们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

二、六军团会师时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10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这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率的八十八师、七十八师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三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里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